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经济学术译丛·当代制度分析前沿系列

# 社会契约演化论

Evolution of the Social Contract

[美]

布莱恩·史盖姆斯

(Brian Skyrms)

申海波 杨培雷

著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经济学译丛  
当代制度分析前沿系列

# 社会契约演化论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美] 布莱恩·史盖姆斯 著  
(Brian Skyrms)  
申海波 杨培雷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契约演化论/(美)史盖姆斯(Skyrms, B.)著;申海波,杨培雷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4

(经济学术译丛·当代制度分析前沿系列)

书名原文:Evolution of the Social Contract

ISBN 978-7-5642-1300-8/F·1300

I. ①社… II. ①史… ②申… ③杨… III. ①社会契约-研究

IV. ①F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5734 号

□责任编辑 许旻

□封面设计 周卫民

□责任校对 林佳依

SHEHUI QIYUE YANHUALUN

**社会契约演化论**

[美] 布莱恩·史盖姆斯 著  
(Brian Skyrms)

申海波 杨培雷 译

---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mailto: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教印刷厂印刷

上海春秋印刷厂装订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890mm×1240mm 1/32 5.5 印张 147 千字

印数: 0 001—4 000 定价: 29.00 元

图字:09—2006—082 号

*Evolution of the Social Contract*

Brian Skyrm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Subject to statutory exception and to the provisions of relevant collective licensing agreements,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 copyright © 2012.

2012 年简体中文版专有出版权属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献给鲍林、米歇尔和盖博瑞

同一条船上的两个人协力划桨，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力量协同，遵从的是意思一致或称之为习惯，尽管他们从没有向对方承诺如何去做。这里，与其说存在着行为稳定性法则，不如说它是源自人的习惯。习惯是慢慢生成的，且在缓慢的演进中形成约束力……语言亦如此，语言基于人类的习惯而得以确立，与承诺毫不相干。

——大卫·休谟，《人性论》

# “当代制度分析前沿系列”总序

林毅夫

这些年来我在各种场合经常讲中国经济现象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大金矿,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有可能产生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的信念源自经济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经济现象,其贡献的大小由所解释现象的重要性决定。在现代社会中,各国经济紧密相连,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经济现象影响远大于发生在周边小国的现象。所以,自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大多先后产生于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英国和美国。中国的经济规模很有可能在 21 世纪 30 年代超过美国,中国将有可能逐渐成为一个新的领导经济学思潮的国际中心。如果我的乐观预测是正确的,中国经济学界的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最有可能是来自于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

从工业革命开始西方殖民强权兴起,亚、非纷纷继拉美之后沦为殖民地。20 世纪初民族自决风起云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非、拉被殖民国家终于迎来了民族解放,开始了独立建国后的追赶发达国家的努力。但是,除了东亚的日本和几条小龙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但没有赶上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这个差距还不断在扩大,到 2001 年底,世界人口总数为 61.3 亿人,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占了 81.5%。怎样缩小,甚至赶上发达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问题之一。

根据 Robert Solow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采用同样的技术来生产,发达国家资本较多,资本的报酬较低,那么,发展中国家会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资本积累,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两者的人均收入差距应该逐渐缩小;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并未取得预料中的快速增长。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能解释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Paul Romer 和 Rober Lucas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速度是由人力资本积累、研究和开发、“干中学”等因素内生决定的;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投资多于发展中国家,因此,技术变迁较快,避免了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使发达国家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并且拉大了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然而这个理论也有缺陷,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以及后来加入的中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在 20 世纪最后 30 年间取得了超乎寻常的经济增长,赶上或大大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在追赶时期并未在内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因素上比发达国家有更多的投资。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哈佛大学的 Dani Rodrik、Andrei Shleifer 和 Daron Acemoglu 等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开始把眼光从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转移到制度问题上来,试图从市场的效率、政府干预、腐败的程度等制度因素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发展绩效的差异。<sup>①</sup>

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我国改革前后的经验可以得到印证。主流经济学家间对于市场和政府这两个最重要的制度应该如何发挥各自的作用的认识并没有多大分歧。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发展机构为主的经济学家,根据主流经济学的认识提出了“华盛顿

---

① 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回顾请参见林毅夫和刘明兴为 2003 年 5 月 21~22 日在印度举行的第 15 届世界银行年度发展经济学会议所准备的论文《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落后地区的发展挑战》。英文稿可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网页下载。

共识”，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起，以此共识来推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可是，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 William Easterly 的研究，1960～1979 年间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 2.5%，进行了改革后的 1980～1998 年间增长率反而下降为 0.0%。<sup>①</sup>因此，Easterly 将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称为“迷失的年代”。

“迷失的年代”的出现反映了经济学家虽然已经认识到了制度的重要性，但是对制度是怎么形成的，以及怎么作用于经济的了解远远不足。西方主流的经济学是以有效的市场制度为前提建立起来的，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以 Ronald Coase、Douglass North、Armen Alchain、Harold Demsetz、Oliver Williamson、张五常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出现以后，主流经济学家才越来越多地将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来研究。然而，发达国家本身的制度已经相对成熟、稳定，少有值得研究的大的制度变迁。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差异来研究，对于生活、工作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来说，则又受到文化、历史知识的局限，不易把握问题的实质。所以，制度的研究，尤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结构如何向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演进的研究，是一个有待突破的重要领域。

我国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从落后的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变、又从计划经济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的经验，等于将发达国家需要几百年时间完成的制度变迁压缩在半个世纪里完成，而且，当中还增加了一个非市场经济制度的实验。这些大的制度变革脉络清晰，影响显著，资料易得，不仅可以用来检验现有制度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假说，而且，可以从中提炼出许多新的理论来解释制度的形成和发挥作用

---

① William Easterly, *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1998*. paper prepared for the Global Development Network meeting in Cairo, February 2001.

的机制。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上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研究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成败经验,既是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当代中国经济学人的使命,也是中国经济学家最有可能对当代经济学做出巨大贡献的领域。

1995 年我曾写了一篇“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文章祝贺《经济研究》创刊 40 周年,强调本土问题的研究,必须置于国际学术界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中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之上,才能了解自己的研究对知识增量的贡献在何处,同时也必须按国际学术界前沿的分析方法来表述,才能取得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成果,对国际学术思潮的发展产生影响。这些原则在制度问题的研究上同样适用。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当代西方经济学界的制度研究,除了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外,还出现了以 Kenneth Arrow、Frank Hahn、Joseph Stiglitz 和 George Akerlof 等一批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或使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引进交易费用,或从信息的不对称、克服道德风险的角度来研究制度的作用和选择。这一派学者多是一些建立数理模型的高手,文章大多发表在世界顶尖的经济学期刊上。第三个流派是以博弈论,尤其是 90 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演化博弈论为工具的制度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有 Ken Binmore、H. Peyton Young、Robert Sugden、Avner Greif 等。每一个特定的制度安排都是社会中人们共同接受的制约彼此互动行为的一套规范,它的变革又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结构、发展阶段当中发生,所以,这一流派凭其分析工具之利,最有可能在制度研究上开拓出一片宽广的天地。

1987 年我从美国回国之前,为了了解经济改革的实质意义,曾经花了一段时间阅读新制度经济学和 Kenneth Arrow、Joseph Stiglitz 等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有关制度的论著,后来根据我的读书心得以及对政府在制度变革中作用的分析,写了一篇“An Economic Theory of

*Cato Journal* 上。中文译稿几经周折以“论制度和制度变迁”为名在国内发表。其后,制度分析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课题,国外的著作纷纷被译成中文,科斯、诺思成为国内经济学界耳熟能详的名字。不过到目前为止,引进到国内来的主要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论著,对于新古典主流和博弈论这两个流派的制度分析文献,国内学术界仍然知之甚少。国内有丰富的制度分析的素材,国内年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在数理工具的学习上有先天的优势。掌握这两个流派的研究成果,并以这两个流派的分析工具来从事国内丰富的制度变迁经验的研究,将会是我国经济学家进军国际经济学术殿堂的一条大道。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韦森(李维森)教授最近倡议翻译出版一套“当代制度分析前沿系列”,引进近几年西方几家著名出版社出版的博弈论和新古典主流制度分析的经典名著,以推动我国经济学界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上再上一个台阶,并邀我为这套丛书写一个总序,我欣然答应。韦森君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即已潜心研究当代制度分析的前沿各家论述,后来到英国剑桥访问期间更广泛收集了各个主要学术期刊上的制度分析经典文献。现在,这套丛书经他的策划,即将陆续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韦森君为我国经济学界所做的一个新贡献,也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件盛事。

译书要做到“信、达、雅”是一件辛苦而又充满挑战的工作。韦森君在教学、研究之余,笔耕不辍,随笔文字隽永,发人深省,译著信、雅、达兼备,有上世纪初的译者之风,是主持翻译这套丛书最合适的人选。作为一位关心中国经济学科成长的学者,我感谢韦森君及这套丛书的诸位译者、校者的努力,也期盼这套丛书的读者有志一同,为中国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走向国际经济学思潮的前沿而努力。

2003年5月18日  
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 前 言

关于社会契约,广为人知的传统研究方法是基于理性决策的方法。这种传统方法探讨的是,在事前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业已存在的条件下,理性决策者将达成何种类型的契约。这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传统方法,当代在约翰·哈塞尼(John Harsanyi)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除了上述传统方法外,还有另一种传统方法,即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让·雅库斯·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创立的方法,探究的是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既存、隐性的社会契约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又将如何继续演化?本书致力于这些问题的探索,旨在对第二种传统方法有所贡献。

在一定程度上,黑格尔(Hegel)和马克思(Marx)触及了第二种传统方法。但是,由于缺乏动态演化观,他们求助于关于历史辩证法的奇妙构思。达尔文(Darwin)通过对自然界中再生差异性的观察,注意到了自然界的动态演化机理。正如生物进化一样,社会文化领域也存在着一些再生差异性现象。与不成功的策略相比较,成功的策略中有着更多的互动和模仿。如果采用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语言方式,我们可以说,社会文化的进化和生物进化都是差异性复制驱动的过程。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差异性复制动态模型,现在被人们普遍称为动态复制器(replicator dynamics)。虽然无论从生物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学的角度,这种动态理论都显得过于简单化,但是,它提供了一

一个能够抓住差异性复制关键特征的、便于控制的模型。该模型可以作一般化的构建,进而将突变现象和重构现象纳入模型。这些生物学范畴所反映的事物的规定性,在文化演化的世界里同样存在。在文化领域,突变现象表现为新行为方式的突然出现,思想和策略的重构现象也正是文化神奇性的源泉。因此,运用动态演化论的这些分析工具,我们就能够从一个新的视角来探究社会契约各个方面的特征。

有人会认为,两种方法最终都将得出相同的结论,因为自然选择导致的是非理性结果。这种观点并不正确,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可以循着一个路径,就是关注为何这种观点不正确。本书的第一章将性别比例的生物进化与正义的文化演化并列起来加以分析。这里,我们揭示了进化过程如何呈现了“达尔文的无知之幕”(Darwinian veil of ignorance),<sup>①</sup>在这样的状态下通过简单的讨价还价博弈,常常(但并不总是)能达成一个公正的分工选择。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理性行为理论得出的结论是,在信息充分、行为理性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能够达成有限的均衡状态。第二章揭示了进化可能会消除承担一定成本的惩罚者惩治不公平行为者的行为。尽管惩罚策略是博弈参与人的弱占优策略(weakly dominated strategy),由于它会使结果变得更好而不是变得更坏,所以,它仍将存续下去。第三章展现了理性决策与演化之间的明显差异。如果说演化博弈一般理论允许博弈参与者策略具有相关性,那么,在理性决策博弈理论中,博弈参与者的强占优策略导致了策略的不相关性。相关性解释了“达尔文的无条件命令”(Darwinian categorical imperative),对利他主义和互助的演化条件给出

---

① “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是罗尔斯《正义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指在讨论社会或组织中应当如何对待不同角色的成员时,最好的方式是:每个人都集中到一个幕布后,且每个人都不知道走出幕布之后将成为什么角色,可能成为贫民,也可能成为市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讨论如何对待社会或组织中每一个角色的规则,才能摆脱既得利益的影响,真正实现一个公正的规则,达到对弱勢角色的保护。——译者注

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第四章对对称的最优选择的策略人之间的理性选择难以实现的情况进行了总体分析。动态演化理论可以打破信息对称的魔咒,解释相互关联的习惯的形成机制。产权行为的起源,进而产权概念的形成,就是很好的例子。第五章探讨能指(涵义)是如何自然地与信号博弈中的令牌<sup>①</sup>联系起来的。理性选择理论存在的“啾啾均衡”(babbling equilibria)<sup>②</sup>中,令牌则没有任何能指(涵义),但是,在动态演化理论中,能指(涵义)的演化是必然的。通过一系列与社会契约相关问题的分析,由理性选择视角转向动态演化视角,我们看到了二者的重要差异。在很多情况下,反常情况得到了解释,想象中的悖论也不复存在了。

因此,两种传统的分析方法并不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它们既有相互一致的观点,又有着显著的差异。把握休谟的传统分析方法,我着眼于它的解释力而不是标准化的表达方式。有时,我因能够解释事物如何演化而兴奋;有时,我想,基于任何一个似乎合理的动态演化理论,我就能说出事物演化的原因。或是介于两者中间的情况,也许我能够说明一系列形成特定结果的初始条件。当我对演化理论的分析结果与理性决策理论的分析结果加以比较时,我并不是要对后者标准化理论提出批评,我只是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即两种传统理论对不同问题的探究得出了不同的答案。

虽然在本书所讨论的命题背后存在着博弈理论和动态演化理论的支撑,我还是保留了为学术性刊物所推崇的技术细节。当然,阅读这本

---

① 在流程模型中有两个核心概念,即令牌(token)和信号(signal)。在一个流程的初始状态下,令牌是一条执行路线,指向一个节点;而信号则指示着令牌是否继续执行相应的路线。——译者注

② 这是一个很难对应翻译的概念,有人将它直接翻译为“胡说均衡”,似乎不妥。这里勉强用“啾啾均衡”译之,其涵义是“在廉价博弈(cheap game)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博弈参与各方均认为的廉价磋商毫无意义的结果”。——译者注

书并不需要特定的专业背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介绍了一些有用的概念。我希望并相信,这本书能够被渴望把握令人陶醉的社会契约自然主义论命题的读者广泛接受。

布莱恩·史盖姆斯  
(Brian Skyrms)

## 致 谢

我要感谢很多朋友,感谢他们对本书中的部分或全部内容给出的有益评价。我要特别感谢的是: Justin d'Arms, Francisco Ayala, Cristina Bicchieri, Ken Binmore, Vincent Crawford, Branden Fitelson, Steven Frank, Alan Gibbard, Clark Glymour, Peter Godfrey-Smith, Bill Harms, Bill Harper, John Harsanyi, Jack Hirshleifer, Richard Jeffrey, Ehud Kalai, Philip Kitcher, Karel Lambert, David Lewis, Barbara Mellers, Jordan Howard Sobel, Patrick Suppes, Peter Vanderschraaf, Bas van Fraassen, Bill Wimsatt。我非常感谢后来的朋友和同事格雷格·卡夫卡(Greg Kavka),同他的讨论使我受益良多。本书的第一稿完成于1993~1994年间,那时我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感谢国家科研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安德鲁·梅隆基金会(the Andrew Mellon Foundation)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奖学金(人类学)所提供的资助。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Irvine)位于圣地亚哥的超级计算机中心所提供的帮助,在那里我才能进行一些大型模拟分析。在分别得到《哲学》杂志和《科学哲学》杂志同意的前提下,“性别与正义”和“达尔文与‘决策逻辑’”的主要内容得以再现于本书之中。

# 目 录

总序/1

前言/1

致谢/1

第一章 性别与公正/1

第二章 承诺/27

第三章 互助/55

第四章 关联的惯例/75

第五章 涵义的演化/95

后记/122

参考文献/128

术语对照表/146

# 第一章

---

## 性别与公正<sup>①</sup>

---

① 本章选自我于 1994 年发表的同名文章。一些相关模拟分析结果也被补充到了本章之中。